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八十六）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四五期 ——  
（二〇〇一年一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0 1 a）

【不堪回首】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季羨林
附：论“文革”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强暴	
——读《牛棚杂忆》有感	黄爱萍
【自由论坛】北大文革片段	思考
文革中作为小娃娃的见闻	郑玄
【史海钩沉】文革中的32111钻井队	何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华夏文摘》增刊资讯。

【不堪回首】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 季羨林 •

南口村虽然是一个僻远的山村，风景秀丽，居民和善，但是也决非世外桃源。我们来这里是搞阶级斗争的。虽然极左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别的地方一样，决不是没有问题的，搞一点“阶级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我们哪里想到，在我们在这里搞阶级斗争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已经涌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这一场风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学。

这一点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我们僻处京郊，埋头社教，对世事距离好像比较远，对大自然好像是更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同过去任何一个春天一样，姗姗来迟。山村春来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终于陆续绽开了蓓蕾，一片粉红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们的活动，从表面上来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静。然而从报纸上来的消息，从外面传进来的消息，知道一场大的运动正逼近我们。北京大学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得风气之先的地方。此时我们虽然不在

学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风骤雨前浓云密布那样，也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是因为身居郊外，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而已。

五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中央接二连三地发出一些文件，什么“516通知”之类。事情本来已经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经说到，我脑袋里最缺少政治细胞，缺少阶级斗争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阳光中，在繁花似锦的环境里，懵然成为井中之蛙，从来没有把这一场暴风雨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此时城里的燕园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城里回来的人中得知学校里已经开了锅。两派（或者说不清多少派）之间争辩不休，开始出现了打人的现象。据说中央派某某大员到北大去，连夜召开大会，想煞住这一股不讲法制、胡作非为的歪风。听说，在短时间里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到了五月二十五日，那位“老佛爷”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要干什么？”（标题有误，见本博物馆“文献资料厅”——编者）立即引起了两派人的辩论，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反对。听说在大饭厅附近，争辩的人围成了圈子，高声嚷嚷，通宵达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参加。好像是一块巨石击破了北大这块水中天，这里乱了套了。

这一张大字报的详细内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立刻就感觉到，这是校内社教运动的继续发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谓“国际饭店会议”上，反陆平的一派打了一个败仗，挨了点整。按照我们最近多少年来的运动规律，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准备整别人了。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一张大字报，还附上了什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反正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这好像钉子钉在案板上，铁定无疑了。我们南口村的人当然也议论这一张大字报；可是并没有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派，只不过泛泛一谈而已。此时校园内的消息不断地陆陆续续地传了过来，对我们的事情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干扰，我们实在是不了解真实情况，身处山中，好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轻雷，不见雨点，与己无干，仍然“社教”不已，心中还颇有一点怡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东语系在南口村参加社教的师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总支书记，有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都是被整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当权派”。所有的当权派，除了最高层的少数几个天之骄子以外，几乎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神秘莫测的中国语言把它缩简为“走资派”）。在南口村，东语系的走资派和一般教员和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我们这两位走资派“难得糊涂”，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梦中，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下临无地，只等有人从背后一推，立即能堕入深涧。而个别推我们的人此时正毕恭毕敬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摇着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只哈叭狗。

没有想到——其实，如果我们政治嗅觉灵敏的话，是应该想到的——六月四日，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我们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几床被褥，一个脸盆，顺手一卷，立即成行，挤上了学校派去的大汽车。住了七八个月的南口村，现在要拜拜了。“客树回看成故乡”，要说一点留恋都没有，那不是实情。心头也确实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但是，此时有点兵荒马乱的味道，顾不得细细咀嚼了。别人心里想什么，我不清楚。我们那一位总支书记，政治细胞比我多，阶级斗争的经验比我丰富。他沉默不语，也许有点什么预感。但是此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子。我虽然心里也有点没

底儿，有点嘀咕，我也没有时间考虑太多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一次回家，却好像是走向一个 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燕园。我原来下意识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学生来迎接我们，热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们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还没有什么人罢我们的官嘛。然而，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大道上，横七竖八，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要挤满了自行车。真是洋洋大观，宛如自行车的海洋。至于校内的人和外面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真好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我们的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好像是几点水珠汇入大海的波涛中，连一点水花都泛不起来了。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简直就是想入非非，都到爪哇国去了。

据说从六月一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般涌进燕园。在“马列主义”信徒们眼中，北大是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超过了西天灵鹫峰雷音寺。一次朝拜，可以涤除身体上和灵魂中的一切污浊，一切罪孽。来的人每天有七八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先是附近学校里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的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本地的市民当然是当仁不让，也挤了进来凑热闹，夹在里面起哄。这比逛天桥要开心多了。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还布满了大小字报，内容是一边倒，都是拥护“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五光十色，喧声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余，也挤进了人群。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批斗，没有拳打，没有脚踢。我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混入人海中，暂且逍遥一番。一同回来的那一位总支书记，处境却不美妙。一下车，他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走资派”，罪有应得。从此以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我就没有再见到他。我在外文楼外的大墙上，看到了一大批给他贴的大字报，称他为“牧羊书记”，极尽诬蔑、造谣、无中生有、人身攻击之能事。说他是“陆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骁将，急先锋。陆平的日子当然更为难过。他是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点了名的人，是祸首罪魁，是钦犯。他的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每天能斗上四十八小时。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拥着站在短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主持批斗的人罗织罪名，信口开河。此时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园子里点名角的戏一样。

我自己怎样呢？我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是还没有人来“接”我，我还能住在家里，我还有行动自由。有人给我贴了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也还不多。有一天，我到东语系学生住的四十楼去看大字报。有一张是给我贴的，内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当流行的散文：《春满燕园》。在贴大字报的“小将”们心中，春天就象征资本主义；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我当时实在是大惑不解：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士无不欢迎的象征生命昭苏的明媚的春天会单单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呢？以后十几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这对我仍然是一团迷雾。我的木脑袋不开窍，看来今生无望了。我上面说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臭文，深文周纳，说了许多歪理。后来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等著作，在原来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看来这一套手法是有来头的，至少是经过什么人批准了的。后来流毒无穷，什么“利用小说反党”

等等一系列的“理论”依次出笼，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并不比别人高。我也是虔诚信神的人。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文章里的春天同资本主义毫不相干。我是真心实意地歌颂祖国的春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张大字报，心里真是觉得憋气，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这一哼连半秒钟都没有用上，孰料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谈姚文元文章一样，被什么隐藏在我身后的人录了下来（当时还没有录音机，是用心眼录下来的）。到了后来，我一跳出来反对他们那一位“老佛爷”，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颗重型炮弹。

反正我此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到处逍遥。这时的燕园比起六月四日来，其热闹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那时候，许多边远的省份，受到了千山万水的阻隔，没有能赶到北京来，朝拜北大这一块“圣地”。现在都赶来了。燕园在平常日子看上去还是比较辽阔的。但是，在这“八方风雨会燕园”的日子里，却显得极其窄狭，极其渺小。山边树丛，角角落落，到处都挤满了人。我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太仓中一粒米了。

据我的观察，这一阶段，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所谓“走资派”的。什么叫“走资派”呢？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一个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个头头，他必然就是“走资派”。于是走资派无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觉悟奇低，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总是虔心敬神，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每一个单位必有一个走资派，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每一个大小头头都成了走资派，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怎样来的呢？反正我这个道理没有地方可讲，没有人可讲。既然上头认为是这样，“革命小将”也认为是这样，那就只有这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可怜我们虔诚地学习了十几年唯物论和辩证法，到头来成了泡影。唯物主义者应该讲实事求是。当前的所作所为，是哪一门的实事求是呢？我迷惑不解。

革命小将也决不可轻视。他们有用之不竭的创造力。北大的走资派在脖子上被挂上了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这个天才的发明就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是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木牌这个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些地方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份量愈来愈重。地心吸力把钢丝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鲜血直流。在这方面北大落后了，流血的场面我还没有看到过。但是“批斗”的场面我却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在室外，则走资派站在椅子上，墙头上，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我没有见到过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来还是有的。首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就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上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反正他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后已。这种批斗起什么作用呢？我说不清。是想震慑“犯人”吗？我说不清。参加或参观批斗的人，有的认真严肃，满脸正义。有的也嘻嘻哈哈。来自五湖四海的到北大来取经朝圣的人们，有的也乘机发泄一下迫害狂，结果皆大欢喜，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果然来到了。这种“先进”的经验被取走，转瞬之间，流溢全国。至于后来流行的“坐喷气式”，当时还没有见到。这是谁的发明创造呢？没有人研究过，好像至今也还没有人站出来申请专利。

在北大东语系，此时的批斗对象，一个是我上面谈到的总支书记。帽子是现成

的：走资派。一个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帽子也是现成的：反动学术权威，另外还加上了一项：历史反革命。给他们二人贴的大字报都很多，批斗也激烈而且野蛮。对总支书记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书记”之类的人身攻击。他站在棚前，低头弯腰。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叉。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小说中学来的。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插着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画着红叉。此时书记也享受了这种待遇。批斗当然是激烈的，口号也是响亮的。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

对那位教授的首次批斗是在外文楼上大会议室中。楼道里，从一层起直到二层，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有不少幅漫画，画着这位教授手执钢刀，朱齿獠牙，点点鲜血从刀口上流了下来，想借此说明他杀人之多。一霎时，楼内血光闪闪，杀气腾腾。这样的气氛对一个根本不准发言的老人进行所谓“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见了。结果是参加批斗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昂，真话与假话并举，吐沫与骂声齐飞，空气中溢满了火药味。一只字纸篓扣到了老教授头上。不知道是哪一位小将把整瓶蓝墨水泼到了他的身上，他的衣服变成了斑驳陆离的美国军服。老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勒令“滚蛋”走回家中去的。

到了六月十八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发奇想，要在这一天大规模地“斗鬼”。地址选在学生宿舍二十九楼东侧一个颇高的台阶上。这一天我没有敢去参观。因为我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我这样一座泥菩萨最好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一点。我坐在家中，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后来听人说，截至到那时被揪出来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扬人民之雄风，振革命之天声。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踹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听说那一夜，整个燕园里到处打人，到处骂人，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疯狂肆虐，灭绝人性。

从此以后，每年到了六月十八日，必然要“斗鬼”。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这一天，我也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躬与其盛，千载难遇。此是题外话，这里暂且不表了。

□ 摘自《牛棚杂忆》

∞ ∞ ∞ ∞ ∞ ∞ ∞ ∞ ∞ ∞

附： 论“文革”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强暴  
——读《牛棚杂忆》有感  
• 黄爱萍 •

我曾经看过一部叙述性别歧视的推理片。里边讲到女主人公因成绩优异，曾有被同学轮奸的历史，然而由于身心受到的伤害太重，出于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她怎么也记不起那段历史。然而，她的潜意识里埋着报复的种子，因此上每晚她都会梦游，在梦游中她寻找凶手，实施报复。

我也看过一些文章，讲述有过被强暴经历的妇女，如何忘记过去，重新面对生活。或者她们中有勇气的极少数人，如何把凶手押上了法庭。

不知怎么地，我总觉得在文革中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的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极象遭遇过强暴妇女，他们不提过去的历史，不提文革，乃是出于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有谁愿意老是去回忆不堪回首的往事，回忆自己曾如何地尊严丧尽，活得连狗都不如呢？

季老的书，我最初也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理去借来，一开始，也是抱着一种“有趣”的心态读的。然而，当读到季老竟被扇耳光，被拳打脚踢时，我的心就揪紧了，有一种震撼感——无论如何，还是难以接受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也能被施以这样的暴行。我一度不想再看下去。鼓励我看下去的，是季老的自序——我不想象季老描述的那样永远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去看待文革这段历史。

当看到季老书中的“太平庄”一段时，我的泪怎么也止不住了，怎能想象今天的庄重长者当年曾真地象狗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更难以想象受过如此伤害的他后来是如何重拾尊严和自信，再次站上人生的舞台。

然而，无论今天表面怎样的辉煌，那埋在心底的阴影却是永远难以消除的。当季老在书末反复地疑问：“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了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在“余思或反思”中，季老又提到，“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样的反思在旁观者看了，真是不寒而栗。这和妇女因遭受过强暴便自感失贞有罪恶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季老自己也认为，“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不妙在哪里，其实很简单，在文革中所受的伤害，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轻，对这种伤害的“遗忘”或“搁置”只是出于人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而伤害对于大多数受害者来说，将伴随他们终身。

季老在“自序”中，提出了两个期待。第一个期待是“有人会把自己亲身受的灾难写了出来。”“受害者心里难道会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我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为什么季老的第一个期待落了空？请大家先想一想为什么受过强暴的妇女没有几个肯站出来指控罪犯曾怎样伤害她？我想答案是很明了的。满足这样的期待需要太大的勇气。有几人能自暴伤疤于人前而能不痛苦？更何况强暴者很可能还是有权有势的人物，使勇敢者最终还是只能面对失败的结局，可能还要加上他人的冷言冷语和鄙视。

至于季老的第二个期待为什么也落了空，我想就不用解释了。西方至今仍在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搜捕漏网的纳粹犯——害人者是不会自动跳出来剖白自己的心理变态过程，并请求受害者宽恕的。

我有一个想法：对文革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受害极深的大批知识分子，应该由政府出面，对他们给予补偿，以精神损失费的名义发放这笔补偿费。此外，应该设立匿名账户或基金，使自感在文革中犯有过失而尚无勇气站出来忏悔的人可以向该账户以捐款的方式来表达悔意，捐款全部用作建文革纪念馆之用。

季老在书末《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中提到了中国历史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歧视问题。这种歧视在文革中达到了顶峰，现在难道还不应该矫正吗？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但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他有很多思想继承了封建传统，是非常错

误的。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仍在引用毛泽东同志这些错误的观点，什么“你们知识分子就是不懂事”等等，并以之为真理来评价知识分子群体。最最可悲的，有些知识分子自己还认为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正确的，觉得“知识分子确实不懂事”。（我就亲耳听我的一个老师在课堂上如此评价这句话。）嘻，以“懂事”和“不懂事”来评价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大人以“乖”和“不乖”来评价“好孩子”和“坏孩子”又有什么区别？

历史的悲剧不该重演，但在这之前，我们该做的还很多。中华民族是一个勇敢的民族，而正视文革的勇气应该是对这种勇敢的最好注解。

□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  
【自由论坛】

北大文革片段  
· 思考 ·

我在文革中挨整，可我并不仇视文革。

中共中央的5.16文件明确规定，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这样积极进取的青年却在那时为了个出身就挨整，这说明什么呢？

公平地说，除走资派以外，整人责任并不在毛泽东，反而是他的政敌们，不敢正面对著干，就千方百计乱整人，把社会搞乱，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扭转文革初衷。后来的整人更是疯狂的报复。说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恰如其分的。

最后，他们得了势，再把所有的脏水往毛泽东身上泼。当然啦，开始还不太敢那么明目张胆，怕激起公愤，就利用民众对四人帮的反感，先把一切坏事的责任推到“四人帮”头上。后来见时机成熟了，就一步一步加紧了非毛化，好为他们扫清走割耳扒桥夫之路的阻力。对此，我的认识也是这些年来逐步清晰的。

这里提几件我亲身经历的事：

（一）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孙蓬一（大字报作者中没有孙蓬一，见本博物馆“文献资料厅”——编者）等北大哲学系的干部群众在三角地贴出（后来被毛泽东称为）马列主义大字报，批评北大党委陆平、彭佩云（就是如今的人大副委员长）的错误。当天下午，全北大，包括我所在的北大附中，召开了内部广播大会。由陆平讲话说：现在，右派又开始向党进攻了，号召全校师生奋起反击，等等。人家不过贴大字报提意见，就立刻要大张旗鼓地整人。还好意思说什么若在台上就会给右派平反？不多打右派就谢天谢地了。

（二）“四清”时，刘少奇的老婆王光美搞了个所谓的“桃园经验”，还到处作报告，所有干部职员都必须到会。我的亲戚中不少人都听了那报告，谈起来，都说是又臭又长。后来揭发出来，那是个整人的“经验”。究竟是谁整起普通人来能耐大？毛泽东才不那么小家子气。

（三）文革始于1965年11、12月，普通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去学校里，同学们之间感受到有些气氛不寻常，但也仅限于议论纷纷。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全文登载了聂元梓、孙蓬一等的5.25大字报。这一下，学校炸了窝。课没法上了，学生们纷纷拥到（北大附中——编者注

校党支部，那里正开会，我随著人流冲进去，围住校党支书刘美德，愤怒质问她与陆平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诬蔑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右派向党进攻？我第一次看到一位平时威严无比的堂堂学校党书记突然变得那么唯唯诺诺，面如土色。那一刻，我其实反倒有些同情她了。毕竟，她不也得听陆平的嘛？不过，等我出来，不少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了。这以后的几天，又出现了学生们与团委书记的辩论。彭小蒙就是在那次辩论中显现了她的辩才。尔后，在大字报的署名中突然出现了“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后来知道，它与“清华附中红卫兵”同时成立于1966年5月29日，是全国最早的两个红卫兵组织。后来的“造反有理”的说法也是他们到处散布的。

（四）后来知道，我班里的高干（当时是指行政十三级以上的干部）子弟们与高一三的彭小蒙，高三六的牛皖平是“红旗”的主力。不久，刘少奇派工作组进校，“红旗”的人受到重用，俨然成了学生的“太上皇”。此时，初三六班的“红旗”成员刘某突然发难，写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代代相传”。当天就被那帮“红旗”的把这反动血统论对联加横批贴满全校各层入口处。这显然是红旗的人有意挑起争论。立即引起了极大反响。我们班的“红旗战士”召开班会想压人同意他们的谬论。我第一个站出来与他们辩论。我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必须消灭阶级和国家，如果按他们“代代相传”的逻辑，共产主义将不可能实现。我的观点最后占了上风，气得一个红旗的小头目（外号“钟八癞子”）说，“不能说代代相传，也起码是基本如此！”次日，我来到学校时，那横批已经换成“基本如此——鬼见愁”了。刘少奇与血统论有没有联系？反正他女儿刘涛是当年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头头。整起出身不好的同学老师来，可没手软。

（五）记得是1966年7月24、25日两天，北大召开了辩论大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到会。彭小蒙就是在后一天登上讲台，“最最最”之类话语就是她说出来的。把江青感动得不行。当然，江青也在那次大会的发言中，把家里的事情抖落出来，把邵华（毛岸青之妻——编者注）大骂一顿，下面听众全蒙了。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中央领导也是人，不是神。我当时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深受工作组重用的红旗的代表会在发言中突然倒戈，大骂工作组压制了他们。而那个颠倒黑白的发言居然也深得中央领导欢心。多少年后，看著那班高干子弟们变成民运反华反共之激烈，出卖良心之彻底，倒也明白了许多。

（六）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集会。红旗的人都去了，我们普通学生照例留校，没有见毛主席的份儿。当晚才知道彭小蒙上了天安门城楼。还有毛主席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并提到了北大附中彭小蒙。红旗的人更威风了。雷厉风行冲上社会，在海淀镇及其周围居民区到处抄家“破四旧”。本班另一红旗小头目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他们抄家都是海淀区公安局提供名单地址。得，现在清楚了，那会儿刘少奇实力仍强大，公安局可尽是他那条线上的人。那么，究竟是谁在幕后导演了那场抄家违宪闹剧？

（七）要提一下原党支书刘美德。她不过是有文化的党员干部，被“红旗战士”整得死去活来。有一次，我从高中楼去宿舍楼，亲眼见初一的红旗小丫头们，光天化日之下，对刘拳打脚踢，“坐飞机”，我躲走了，回来时，她们还在那里整人，给刘剃了阴阳头，再泼上污泥浊水。心地如此恶毒，令我对“最毒不过妇人心”有了感性认识。同样是党支部副书记的贾校长却因出身好而屁事没有。

（八）1966年8月底，全校被控制大权的红旗拉到门头沟，部份幸运的同学下井，我们一帮出身不好或不大好的在另一些“红旗战士”的带领下，去了妙峰山公社，后又去军庄公社。就是在那里，“红旗战士”们精心策划了对班上所有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批判。我第一次挨整。



（九）在无比艰苦的农村生活了数月，快入冬了，红旗看守们全不声不响地溜了（后来才知他们早就游山玩水“串联”去了，那时就那么可恶，心不黑才怪）。消息终于传来，大家也就决定打道回府。谁知，到家就一病不起，串联没赶上。高干子弟中所谓的“老红卫兵”组成了西纠、东纠、海纠，到处私设公堂，对他们怀疑的人进行刑讯逼供。民愤太大，中央文革把他们解散了，于是矛盾爆发。而当时正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所有被压抑被整得死去活来的普通百姓终于允许组织起来，造当权走资派的反（所谓“造反派”）。而“联动”也就作为造反派的反面出现。我班上的宫小吉是联动宣传部长，牛皖平是“司令”，高一二的周春英是联动的“女司令”。不久，我病好回到学校，发现已经有同学团结起来，造“红旗”的反，我毫不犹豫地参加进反对“联动”的行列。原因很简单：我反对“联动”到处打砸抢的违宪行为。谁是“联动”后台？与刘少奇又是扯不清楚！如今那无耻之尤的魏京生就是“联动”干将。

（十）文革开始时，专家学者的父辈亲友们只要不在学校工作，都没什么事。真正被关进“牛棚”，是1968年4月份，“清理阶级队伍”。照我看，那是党内斗争矛盾激化了，于是，整知识分子来转移目标。而1970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则纯粹是曾被打倒过的老干部进行的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一扩大化，把我这出身不好的也给整进去了。

回忆往事是件痛苦的事。但思前想后，我不认为毛泽东要为文革中的一切错误承担责任。他只应当承担他错的部份。而全面否定文革，并借机修改宪法，剥夺全国人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权力是极端自私短视的行为。当今腐败之泛滥成灾，与此有密切关系。

平心而论，正是文革，在短时期内教育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彻底破除了迷信的狭隘，成为善于独立思考的一代人。正是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把知识在最短的时间内带给了边远山区，教育了贫苦农民。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农民的最大帮助。这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个巨大的贡献。

□ 原载《大家论坛》2000年5月6日

∞ ∞ ∞ ∞ ∞ ∞ ∞ ∞ ∞ ∞ ∞

文革中作为小娃娃的见闻

• 郑 玄 •

我在文革的时候的一段时间，是在江南的一个城市渡过的。为什么会到这个城市去，是因为当时的血统论连累到了父母。因为祖上都是所谓的学者，总之根不红，苗不正，所以当时就被下放到了工厂。

小时候的记忆，符合现在一般宣传说法的是：话不能乱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家的所谓家庭成份不好。我的这个家，算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也就是被冲击的那一种家庭。家里上到祖父这一边，到外祖父那一边，到阿姨姑嫂，百分之八十在教书或搞研究。因为这样，恐怕我本人的消息来源也有问题。但具体说一下，算是和大家讲讲文革中一般知识分子家庭的遭遇。

要说大鸣大放，反正我们家是没有大鸣大放的权力的，也不敢。也没有听说亲戚中谁敢大鸣大放。血统论，连坐法，这些我认为非常错误的作法，当时的确就用在知识分子的头上。要说学生乱来，也的确有这样的事情。我的至亲中的某一位，是当时这个城市的一级模范教师。被学生在文革中抓出去挂牌子，一站就是一个星期。但没有被打。不知道是不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我的另一位亲戚，算是个大学者，文革家里面被抄过家，又被送到五七干校学习（不知道这是不是文革的事

情），可也没有在文革中被打过。他到五七干校，那里的干部叫他写在民国时候有无加入国民党之类的黑历史，他想了一天，找干校的人说我实在想不出自己加入过什么政治组织，第二天就被放了。但家里面的东西，的确是一干二净，影响到了研究成果否，不知道。他的邻居某家，听说情况就惨了一些，后来杨振宁回国的時候，因为此公是其老师（讲到这里不少人大概也知道此公是谁也），要去陪同总理见杨，就把他家装修了一番。

虽然如此，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幸福的童年。父母亲每天高高兴兴去上班，回来给我们讲故事。有历史故事，有小儿故事，有革命故事。在我自己的记忆里，从来没看见什么凶神般的红卫兵冲进来。我自己住在个小四合院子里，邻居有一户工人，有一户是旧社会被强卖给别人的童养媳，有一户是这里的老房东。大家都处得很好，小孩子们在一起玩，玩打美国鬼子，打日本鬼子。那个童养媳晚上闲着没事，就给我们讲旧戏，倒是在别处很少听到的。她本来被强卖给一个上海的商人，后来共产党来了，把她救了出来，还给她分了房子。我们门口的一个邻居老头，叫作王爹爹。听父亲说，此人原来在旧中国是个鸦片烟鬼，后来解放了，给送进了戒毒所，从此再也不抽鸦片了。

有人说什么文革中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反正我以前的帖子说过，经济学界（我说的是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界）的通论不是这样。但文革中大陆的经济發展速度不如台湾省、香港等。可你要想想四小龙是经济学中的S O E (Small open economy), 当时在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进行开放贸易，而大陆四面敌国，一穷二白，一切都要在封锁的情况下自力更生，谈何容易，谈何容易啊！大陆在这种情况下，还是高增长的国家。

我没有看见所谓的不干活发生在父母亲身上。我二岁的时候，父亲在工厂里面搞技术攻关，干了七天七夜，最后大出血晕倒在厂里面。厂长等把他送到医院，多亏上天保佑，没出性命危险。我自己近来也问父亲，是不是因为你是知识分子，工人就歧视你？父亲大笑说：哪有那回子事情。和工人相处，比老九相处好多了。工人和你肝胆相照，那把你当外人？日本人搞出电视机不久，我们国家上海的金星厂也就开始搞。父亲大人那时候从上海搞来图纸，也在他那个小厂搞。我小时候看老爹这么干，总觉得挺好玩的。后来，大概是文革结束刚不久吧，他老把图像调出来了。请全厂的工人一起到工厂所在的某公花园的大庭院里面看电视。我记得自己上去摆弄电视，被父亲回家大训一顿，说小孩子怎么这么喜欢当众瞎玩？文革末的时候，父亲接手搞中型计算机（打孔的那一种），厂里面也是很支持的。据父亲回忆说，就是市里面人怕搞不出来，砸了锅。市里面的头头来找父亲，说：老某，你可知道，这东西你接下来要是作不出来是要坐牢的啊。父亲说没关系。后来搞出来了，上下都高兴得要命。星期三政治学习是有的，但没听说因为这些政治学习就把科研彻底拉下了。但是，搞政治运动太多的那一阵子科研受冲击的说法，我认为是准确的。父亲的组里也不是只有旧家庭出来知识分子，也有清华出来的贫农子弟，有从朝鲜回来的战俘（我们叫他马叔叔），也没看见大家勾心斗角。只有一次，父亲回来和母亲说，某某近来不太干活。结果我小孩子嘴里面藏不住话，见了某某就指着她说：某某不干活。后来又被家长教训。冷眼兄当年驳我说：他的亲戚在文革中出成果。我相信这是不假的。（话说回来，文革以后也出了很多成果，这也是我的看法）。

我没有亲眼看到，可是这也是事实。我在那座城市的一座名刹，听父亲说以前有许多金玉的佛和菩萨，的确被红卫兵给洗劫了。后来红卫兵要去另一座全国名刹，解放军奉了总理的命令赶来了，不许动。

小的时候，家里面的确生活条件不比现在。可是就是我们这样一个被冲击的家庭，左右姻亲上十几家，没有听说谁家因为是成份不好，就有病不给看的。“伤痕

文学”说什么学术权威在医院里面被斗，所以是学生孩子给人看病。我某至亲一家都在医院工作，也算学术权威，没听说不得给人看病。文革里面找他看病的人多着呢。可是我的老师某，当时当知青，一场大病，找当地的赤脚医生来看，被误诊，差点儿送命。台湾的网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赤脚医生——大陆以前，农村里面只有郎中，医疗条件也差。毛主席希望改善农村的医疗状况，就希望医生到农村去，也希望农村自己多出医生。响应号召的年青人居多，他们给人看病不收钱，可经验不足，也不用领到牌照，所以小病可以看，大病就不行了。文革后不久，赤脚医生制度就崩溃了，也发生了不少农民花不起钱看病的事情。下面还要讲到。

我在文革中小学受到的教育，除了打倒帝修反以外，就是那么个小孩子，也有社会活动。那时候，听说要搞学工，学农，学军。我参加过一次学农。就是孩子们排着队，去农村帮农民伯伯干活，然后老师就和我们说：农民伯伯多辛苦啊，你们要向农民伯伯学习之类的。大致如此。我们还间或组成小组，去汽车站，去桥头“作好事”。还记得有什么“雷锋行车一千里，好事作了一火车”之类。在车站看见老太太拎不动东西，我们小组就帮她把东西拎回家。在桥头看见拉板车的师傅，我们就一拥而上地帮他在后面推。总理去世的时候，我在班上，举班痛哭流涕。老师在上面哭，我们在下面给感染，也跟着哭。回家家里面都自发地搞小灵堂，给总理鞠躬。

后来四人帮被打倒了，文革结束了。我作为小孩子的第一个小奇怪就是刘少奇，本来不是大坏蛋么，怎么突然又登上照片了呢？

我知道自己的家庭，不是文革中被冲击很厉害的家庭。恐怕大知识分子中被冲击的面更广，受害也更深了。可是作为一个正常的受冲击的知识分子家庭，看看左右姻亲的家庭，觉得还是有点代表性的。总之，不是太好，但也没那么惨。对于我自己的个人家庭来说，文革以后，当然是比文革中好了。

可是我父母那些同事们呢？改革开放以后，父母亲就回大学教书了。母亲有一次给我来信，说她回了一次原来的厂子，回来真是很不好受。开放以后不久，那个厂子就给挤垮了，她的那些老同事工人，一个个下岗在家，没有工作。那时候还不如现在，没有给教授们怎么涨工资。母亲也没有几个钱，可还是请老工友们下馆子。母亲给我的信里面说，她看见自己的老同事这么穷困，自己都想哭。有一个工友来不了，说病了。她丈夫为了给她治病，借了几十万块钱，不知道怎么还呢。又责备我说：你这个学经济的，倒是告诉我，怎么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会变成这样？

从这点儿，我还得感谢毛主席，要没有他老人家让我们这个老九家庭和工人们混在一起十余年，就冲我们这些代代读书的家世，哪里有机会真正去替那些下岗的工人想想？母亲是个搞理工的，不善行文，可是真情的流露，却远胜过我看见的一些清流的干号。我们的改革开放，有很多不可避免的结构调整。可是在现在比文革好的多的经济基础上，对大批收入为中下层的照顾，却甚至还不如毛主席犯错误最严重的文革时代，这不是可悲的事情么？

~~~~~

【史海钩沉】

文革中的 3 2 1 1 1 钻井队

• 何 蜀 •

◇ 血战火海英雄事迹动神州

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不久，1966年6月2日凌晨1时，四川南部合江县天然气井塘河1井，正在进行投产前的关井测压时，突然发生井喷事故，

井场顿时变成一片火海。在这里钻井的3 2 1 1 1钻井队职工迅速投入了制服井喷、扑灭火海的战斗，用鲜血和生命保住了这口大气井。全队6人壮烈牺牲，21人光荣负伤。

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

就在这一天，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批转的北京大学工作组第9号《文化革命简报》（对于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六一八事件”的处理意见），已经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到全国各地（后来这成为刘少奇“镇压群众”的罪状之一）；中共中央华北局驻北京大学工作组这天正在召开全校万人大会揭露、控诉“陆平、彭佩云黑帮”，竭力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正轨”；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均因发生了少数师生反对工作组的“六二〇事件”而处于动荡之中；清华大学工作组这天正在根据上一天“右派学生”蒯大富公开提出要向工作组夺权的“阶级斗争新动向”，部署开展“斗蒋南翔黑帮”与“反蒯”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亲手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这天则在家乡韶山的滴水洞别墅里独自思考着下一阶段的“战略部署”……

三个月后，3 2 1 1 1这个数字组合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官方传媒中。中共石油工业部党委授予3 2 1 1 1钻井队“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称号，追授该队已牺牲的张永庆等六人及授予在“血战火海”中表现突出的张仲珉、雷洪炳、王存友、王有发、胡德炳、冉树荣、彭家治等七人“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称号；授予牟茂修“五好家属标兵”称号；授予李治国等十六人“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称号。

9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3 2 1 1 1英雄钻井队扑灭火海保住大气井》的报导，称之为“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并为此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人民的灵魂》。社论以极具时代特色的、被称为3 2 1 1 1英雄钻井队豪言壮语的一段话开头：

把毛主席的指示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社论高度评价了这个钻井队：

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扑灭了一场冲天大火，在中华儿女的英雄史册上写下了最新的一章。他们是集体的黄继光，集体的邱少云，集体的欧阳海，集体的麦贤德（黄、邱、欧、麦均为当时人所共知的解放军英雄人物——编注）。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品质和伟大毛泽东思想的结合。

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人民日报》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记3 2 1 1 1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血战火海的勇士们》。3 2 1 1 1队人员头戴铝盔披红戴花的集体照片及获得荣誉称号的每个英雄的照片、伤员们在北京治伤情况的照片、美术工作者赶绘出来的宣传画、连环画等，都由新华社发给各报刊载。

中共中央对这个英雄集体的事迹十分重视，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跃升为中央第四号人物，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陶铸，领导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宣传3 2 1 1 1钻井队英雄事迹的办公室，下辖报告团、演出队、展览队三套人马。3 2 1 1 1队的大部份人员连同他们“血战火海”的一些现场实物被一起送往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务院农林、财贸、外事各口政治部，全国妇联、国家体委政治部，各中央局，中共四川省委，都纷纷向下属单位发出通知，号召学习3 2 1 1 1钻井队英雄事迹。

国庆节前夕，应邀参加国庆观礼的32111钻井队赴京人员，作为“毛主席的客人”住进了中南海。9月29日下午，周恩来、陶铸、康生、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石油战线32111队等先进单位代表。32111队的张仲珉、冉树荣、雷洪炳、彭家治、王存友、王有发与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等一起受到接见。周恩来在讲话中表扬32111队毛主席著作学得好，用得好，把毛主席的指示变成自觉的行动，把革命的利益当成自己的第一生命，表扬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的集体。30日晚上，32111队人员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为庆祝国庆举行的国宴。周恩来向其他来宾热情介绍：“这是我们的救火英雄！”

10月1日，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周年的盛大集会 and 游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以红卫兵为主体的150万游行大军。这是他第四次检阅红卫兵。在游行开始前，林彪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讲话之后，由中央挑选出来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和少数民族代表分别站到毛泽东身边讲了话。

代表全国工人阶级讲话的，就是32111钻井队的青年工人王有发。在他照本宣读的那篇由宣传部门捉刀代笔、经有关领导反复审定的讲话稿中，在那段已经家喻户晓的豪言壮语后面，加上了那篇《人民日报》社论中总结的几句话：“把读毛主席的书作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把毛泽东思想化为自己的灵魂，把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变成自觉的行动，把革命的利益当成自己的第一生命。”周恩来给毛泽东介绍王有发是32111队的工人时，毛泽东握着王有发的手笑道：“就是那个打火队嘛！”

毛泽东与王有发亲切交谈的照片刊登在各大报的头版显著位置。

至此，32111钻井队的英雄声誉达到了顶点。

10月4日上午，32111队代表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了首场报告会。大会开始时，头戴铝盔、身穿工作服的32111队人员高举红旗和石油工业部颁发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钻井队”锦旗，绕场一周，全场听众起立，挥舞《毛主席语录》向英雄们欢呼致意。

《人民日报》在那篇社论中断言：

这个钻井队的英雄事迹，出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决不是偶然的。它象一颗红色信号弹，向人们宣告：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随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的到来，我国人民必将以更加高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像，出现在东方大陆上。

“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今天已经众所周知。不过，许多人尚不知道，就在这“深入发展”中，仅仅几个月之后，32111钻井队这个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集体，就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陷入了“全面内战”的悲剧火海之中。

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 钻井队也展开“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32111钻井队正在四川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石油

大会战。还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陆续从大庆、克拉玛依、玉门等油田调来的精兵强将，从成都、重庆、荣县、威远等地招募来的民工队伍，就已在川南、川中、川东、川西北的许多地方摆开了“开气找油”的战场。参加会战的人们都兴奋地获知：要在四川拿下第二个“大庆油田”。

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毛泽东作了有关指示，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彭真、贺龙、李井泉等从1965年底开始先后前来视察并作了重要指示。石油部把能不能打好这场会战看作是“石油部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还是下半旗”的重大原则问题，曾参加指挥大庆石油会战的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受命担任四川石油会战总指挥。

在威远县城北约20公里的曹家山山沟里，会战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安营扎寨，依傍山坡建起了一片“干打垒”平房，300级台阶直达山梁顶上的千人大礼堂，礼堂顶上矗立着很远都能看见的彭真题写的“红村”两个大红字（彭真被打倒后又换成了林彪的“四个伟大”题词）。各矿区、各工地都传达了这样一些斩钉截铁的上级指示：

“在四川找不找得到油，关系到国家安危，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和世界革命！”

“大庆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山东用主席思想找到了大油田，难道你们四川用主席思想就找不到大油田？”

许多矿区、工地上都写着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标语口号：

“恶战恶战再恶战，一定拿下大油田！”

“头可断，血可流，不完成开气找油任务，我们死就死在钻台上，埋就埋在井场里！”

32111钻井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投入忘我工作的。那篇新华社通讯中有这样的描述：

今年二月间的一个晚上，从上级领导机关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向石油战线职工发出的找气找油的战斗号召。这时已是四点钟了。能延迟到天亮再向大家传达吗？不能！一分钟也不能推延！一秒钟也不能推延！全体职工立刻在井场上紧急集合起来。毛主席的战斗号召，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在星空回响。……当天上午，他们就开始翻山越岭，奔向千里之外的新井场。赶到目的地，大家一不问住，二不问吃，扔下背包，就摸黑干了起来，立誓要给祖国找到更多的气田和油田。

就在这个月下旬，彭真（在他即将被打倒的前夕）来到红村视察，指示说：“搞好三线建设，我们少睡觉，让毛主席多睡觉，睡好觉。”

然而他万想不到，毛泽东正为身边睡着“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包括彭真在内）而睡不好觉……

就在工人们“苦战恶战六六年，一切为了找油田”，一心要拿下大油田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喜的时候，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像突如其来的井喷燃起的烈焰一般席卷了中国大陆。

在四川石油会战的各矿区、工地，各级党委也跟领导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照例进行了慷慨激昂的动员，照例建立起了“文革办公室”、“文革领导小组”，也到

处开始了揪“小邓拓”、“小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原来热火朝天进行生产竞赛的誓师会、庆功会、打擂比武会，被杀气腾腾的声讨会、批判会所取代。原来贴满墙头的大红纸的挑战书、决心书，被白纸黑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覆盖……

3 2 1 1 1 钻井队自然也不例外。在这个小小的基层生产单位里，也一样开展了“文化大革命”。也一样要揪出“牛鬼蛇神”，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的惯例和上级统一部署，钻井队职工也被暗中进行了政治“摸底排队”，划分一、二、三、四类，确定谁属于运动“动力”，谁属于运动“对象”。

最具讽刺意味，也最发人深省的是，后来在井喷事故中殉职而被追认为烈士的副班长张永庆，这时就在“摸底排队”中被“打入另册”，划入了不可靠的类别。后来因为他牺牲了，又是牺牲的六人中的副班长，领头人，不仅被追认为烈士并追授“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称号，那篇新华社通讯还将他放在了突出地位，称他为“模范共产党员”。他的日记被作为重要遗物送交展览——若不是后来局势动乱，还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前的《雷锋日记》、《王杰日记》那样经“整理”后出版。新华社还专门播发了由《工人日报》通讯员和记者采写的通讯《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记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模范共产党员张永庆烈士》。在新华社播发、各大报刊载的《3 2 1 1 1 钻井队英雄日记摘抄》中，张永庆的日记摘抄被放在头条。

在“血战火海”之后，“运动”毫不含糊地继续进行。在这个钻井队被揪出来的批判对象，除去通常的“反党”、“反革命”一类帽子外，有的还多出了一顶独具特色的帽子：“怕死鬼”。

7月下旬，石油战区突然奉命撤销工作组。派工作组领导群众运动，本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改革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一直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时却出人意料地被毛泽东斥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专政”。本来对“文化大革命”就很不理解的众多领导干部，这时就更是无所适从。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通知各基层单位，暂停“大鸣大放”，只开展学习3 2 1 1 1 队的正面教育。

但是，很快又传来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喜讯”，全国城乡敲锣打鼓欢呼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没有几个人会想到欢呼来的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各级领导干部又手忙脚乱地紧跟中央精神继续领导运动。

8月底，得到毛主席、党中央赞赏、支持的红卫兵的“革命大串连”，将造反之火燃到了各地。为防止发生动乱，维护生产秩序，“保卫文化大革命”，许多地方都由官方部署建立起了赤卫队、纠察队一类“群众组织”。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也指示各单位由政治、保卫部门负责，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了“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赤卫队一建立，马上采取“革命行动”，到处以“宣传《十六条》”的名义打击“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牛鬼蛇神”，并从群众中揪出一些“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游街（山沟里无街则游工地）示众；他们还分兵把口，阻拦同样是“宣传《十六条》”的红卫兵进入石油矿区、工地；检查职工邮件，没收私人信件中寄来的外地传单……一时间到处笼罩“红色恐怖”，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生产秩序井然，运动“健康”发展。

3 2 1 1 1 钻井队也在8月29日奉命建立了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两位“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党支部委员胡德炳和副指导员雷洪炳被任命为该队赤卫队正副指导员。在那篇新华社通讯中，曾浓墨重彩地记叙了他俩的英雄事迹：雷洪炳三次昏倒、三次站起来冲进烈火中去打开放喷闸门；胡德炳从烈火中抢救出被毒

气薰倒的同事后自己也昏倒、醒来后又冲进火海去开三号闸门……此时，他们又决心将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落实在行动上。随后，3 2 1 1 1队就佩戴着赤卫队袖章上北京，赴大庆。他们都相信赤卫队是同红卫兵一样“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光荣的革命组织。但是，当3 2 1 1 1队到北京后。面对史无前例的复杂形势，他们才知道事情并非钻井采油那么简单。

这时，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得如火如荼。《十六条》将领导干部划分成了四类，因开发大庆油田而立下功勋、被誉为“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的石油工业部，按照工人们的理解，自然应该属于“一类”干部，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是部机关里却也贴满了大字报。“好学生”怎么也会遭到这么多人批判（有些罪名还大得吓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鼓励群众用大字报这种手段开展“文化大革命”，但是石油部领导却又给3 2 1 1 1队人员规定了纪律，再三告诫他们不准看大字报，在部机关里不准看，上街也不准看。从一些干部的谈话中，使人觉得仿佛是有右派学生在制造“匈牙利事件”，又要开展一场“反右派运动”，但是毛主席、党中央不但没有像五七年那样号召工农兵起来反击右派，反而告诫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毛泽东多次接见、官方传媒中大肆歌颂的“革命小将”红卫兵，有关领导们却竭力不让3 2 1 1 1队人员与之接触……

这些在“血战火海”时毫不犹豫、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茫然了。当时有一首歌这样唱：“工农兵，心最红，文化革命当尖兵！”“工农兵，眼最明，香花毒草分得清！”面对如此复杂、诡谲的政治局势，叫这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们怎么能分得清？又怎么去当尖兵？

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北京的报告会中，3 2 1 1 1队代表们的发言稿里，增加了这样的新提法：“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血战火海的精神，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就跟当时那些充斥报刊的“咱们工人阶级坚决不答应”、“俺们贫下中农肺都气炸了”一类“工农兵发言”一样，3 2 1 1 1队的报告稿自然也是由宣传部门指派的“笔杆子”精心炮制，又经若干领导干部层层审查后定稿的。这里所说的“走资派”，显然还只是指彭真、邓拓以及北京大学陆平、清华大学蒋南翔这样的经中共中央批准点名批判的“黑帮”。这些文字一经由3 2 1 1 1队的代表宣读，并由新华社播发、报纸刊登后，就变成了“工人阶级的声音”。然而，主持炮制这些文字的领导干部们不会想到，那块现在由他们搬起来砸别人的石头，不久就会砸到他们自己的脚上。

年底，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引发群众性造反浪潮，各地各行业都开始陷入动乱，党政机关近乎瘫痪。在大庆油田和大港油田作过报告后，3 2 1 1 1队人员被通知取消再赴克拉玛依油田、胜利油田等地报告的计划，“回本单位闹革命”。

#### ◇ 英雄集体起来造反了

12月4日，3 2 1 1 1钻井队所在的川南矿区的一支造反队，来到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所在地红村，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会战领导小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中央精神，是毛主席的号召，会战领导小组不得不指示会战政治部通知附近各单位派人赴会。造反派与到会表示抗议的赤卫队展开了辩论，发生了磨擦。在红村附近，还发生了前来参加大会的民工与阻止他们的赤卫队间的武斗事件。四川石油战区也开始动乱了。

三天后，3 2 1 1 1队赴京人员回到成都。这时，四川的局势令他们眼花缭乱



，目瞪口呆。在重庆已发生了造反派与工人纠察队大规模武斗的“一二·四事件”，在成都已发生了造反派与产业工人战斗军大规模武斗的“红照壁事件”。“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已经被喊得震天响。3 2 1 1 1 队的英雄们已经不再像两个月前那样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人物了。

1 9 6 7 年 1 月 1 1 日，由毛泽东授意，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 3 2 个群众造反组织发出《贺电》，称他们在上海的造反行动是“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并说“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全国人民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新的工人阶级“光辉榜样”。

第二天，就在全中国一片欢呼中央致上海造反派《贺电》的喧嚣声中，3 2 1 1 1 钻井队赴京人员全体返回川南矿区。这时，“造反”已是得到毛主席、党中央支持的时代大潮，官方传媒一再号召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红卫兵、造反派的行动“好得很”，谴责那些说造反行动“糟得很”的论调“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这时反对造反，就跟当年陈独秀反对农民运动的罪名一样了。

那篇记叙 3 2 1 1 1 队“血战火海”英雄事迹的新华社通讯，标题是《毛泽东思想指挥我们战斗》。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按照当时毛泽东所赞赏的、官方传媒大力宣传的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中的说法，“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一个被誉为“把毛泽东思想化为自己的灵魂”的工人阶级英雄集体，能不造反吗？

于是，一批 3 2 1 1 1 队职工起来造反了，他们成立了“六·二二”革命造反队。三天后，造反队声明砸烂“资产阶级保皇派”赤卫队，勒令钻井队队长周文华交出赤卫队旗帜、袖章，造反队员与赤卫队指导员胡德炳等发生了冲突。随后，这个造反队加入了于 1 9 6 6 年 1 2 月底成立的四川石油战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川油司）。

很快，从官方传媒中得知，毛主席、党中央并不支持赤卫队之类“保守组织”，1 月 1 9 日，新华社还播发了上海《文汇报》刊登的九个赤卫队员的《向毛主席请罪书》。各地报纸纷纷转载。是作“资产阶级保皇派”，还是作“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当然是无须考虑的问题。赤卫队迅速瓦解。3 2 1 1 1 队原赤卫队人员也宣布反戈一击，起来造反，一些人另外成立了一个“红色造反队”。

与此同时，留在北京住院治疗的 3 2 1 1 1 钻井队伤病员王有发、徐元才、杨淑云、冉友松、张仲珉、李治国等联名于 1 月 1 5 日致信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红卫兵，祝贺红卫兵“在批判石油部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取得辉煌的战果。”他们在信中表示：“……我们是毛主席的工人，要冲破一切阻碍和阻力，一定要把石油部党委和会战领导小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虽然身在病房，也要关心国家大事、文化革命大事。……我们对石油部党委内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表示愤怒，辜负了我们石油工人对党对毛主席的一片忠心。”在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与石油部造反派联合向石油部党委夺权后，这封信被列入《来自石油战线的贺电和贺信》中，发表于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宣传组主办的《红色造反报》1 9 6 7 年 1 月 2 4 日第四号上。

1 月中旬，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在红村召开了“四川石油战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大会”。以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为首的会战领导小组“走资派”们被揪到大会上批斗。

3 2 1 1 1 钻井队的造反队员和一些在家休假人员被专车接到红村参加大会。在欢迎他们的大会上，3 2 1 1 1 队成员当众撕毁了赤卫队旗帜和袖章，扔到“走资派”身上，表示与“走资派”彻底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3 2 1 1 1 钻井队副队长、“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在大会上发言，愤怒控诉石油部和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的“走资派”千方百计阻挠3 2 1 1 1 队职工参加“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

英雄钻井队也起来造反了，这自然被看作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不久，彭家治被造反派推选为川油司负责人（当时美称为“勤务员”，现在鄙称为“头头”）。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宣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向走资派夺权是毛主席的号召，自然应当又毫不犹豫地“落实在行动上”。1月26日，川油司在红村向会战领导小组及会战指挥部夺权，建立起了带权力机构性质的“临时生产筹委会”，彭家治被推选为负责人，挑起“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与此同时，3 2 1 1 1 队的造反派也在钻井队夺权。

#### ◇ “革命”与“反革命”的反复易位

夺权导致局势进一步动乱和群众进一步分裂。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按照惯常的“阶级斗争”思路，毛泽东在1月28日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的《中央军委命令》中，第一条里就提出了“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经毛泽东审定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最后一部份也着重谈了镇压反革命的问题。

于是，在许多地方掀起了“二、三月镇反运动”浪潮。有的是夺权后的一派群众组织以“新生红色政权”名义向持不同意见的另一派群众实行“专政”；有的是参加“支左”的部队或公安机关（有些还只是公安机关中的造反组织）对一些与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或参加了夺权的造反派组织进行打击。情况错综复杂。

川油司下属的一些组织及人员也陆续成了打击对象。川南矿区最先造反的一派群众组织首当其冲被打成了“反革命”。为了与“反革命”划清界限，3 2 1 1 1 钻井队原“六二二”造反队负责人之一、“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王存友及一部份造反队员，于2月13日宣布退出川油司，同原赤卫队负责人雷洪炳、胡德炳及原“红色造反队”一起，另外成立了3 2 1 1 1 队“革命造反团”。2月23日，川南矿区对川油司有不同意见的职工，成立了川南石油工人联合联络站，3 2 1 1 1 队的胡德炳和“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彭美凤被推选为负责人。

2月底，“镇压反革命”已成为主旋律，川油司也力图紧跟形势，以示自己是“革命左派”，一面将已被打成“反革命”的下属组织和人员统统开除，“纯洁组织”，一面将红村附近一个以民工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一二·四”打成“反革命”，抄砸了该组织总部，并向当地公安机关整理报送了该组织的“反革命罪行材料”。然而，这一切并不能使其免遭打击。

在一片“镇反”声中。3 2 1 1 1 钻井队属于川油司一派的“六二二”造反队被打成了“反动组织”，一些成员被3 2 1 1 1 队“革命造反团”批斗，逼迫“向毛主席请罪”。昨日在“血战火海”中并肩战斗的战友，今天成了势不两立的“革命”与“反革命”。

3月4日，红村地区戒严，川油司、“一二·四”等造反派组织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一些成员遭到逮捕。彭家治因是见过毛主席的英雄，幸免于被捕，但因他参加了川油司工作和石油战区的夺权，被32111队“革命造反团”宣布开除出该钻井队，不再承认他是这个英雄集体的成员。

在“镇压反革命”的浪潮中，以原赤卫队人员为主体的反川油司一派群众，在“砸烂川油司”的同时，在红村建立起了另一个带权力机构性质的四川石油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川油筹委会），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负责人之一王存友被推选为筹委会负责人。又一个“血战火海”的英雄、“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被推上了领导石油战区“抓革命促生产”的岗位。

整个形势似乎又返回到了1966年6、7月间批斗“牛鬼蛇神”的“正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规范大字报张贴区域，布置打扫环境卫生……毛泽东大概觉察到了这有违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于是又从3月底开始，在他批准下发的一系列中央文件、党报党刊社论里走向另一个极端，强调不能动用专政机关把有不同意见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已逮捕的要立即释放，已打成“反革命”的要一律平反。毛泽东于4月6日批示“此件很好”下发的另一个《中央军委命令》中还明确提出：“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一概不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等。官方传媒中“坚决粉碎反革命逆流”的调子变成了“坚决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前一段时间里将“镇压反革命”说成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时“镇压反革命”本身却又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了。各地监狱纷纷放人，一度被压垮的造反派组织又重新恢复、集结，与曾经对他们实行“专政”的一派群众组织矛盾更加激化。

从4月初至5月初，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一系列会议。由一些红卫兵护送上京告状的彭家治，作为四川石油战区造反派代表和“血战火海”的英雄，获准参加了会议。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这个被称为《红十条》的决定正式宣布打倒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等“走资派”，另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决定》还指责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肆逮捕革命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为一些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组织平反的同时，又将另一些群众组织打成了“走资派操纵的保守组织”。“革命”与“反革命”再次易位。

就在这一天，一些已经从北京得到消息的红卫兵抢先来到红村宣传“中央精神”，鼓动川油司等造反派重新起来向“保守派”反击。川油筹委会一派的32111钻井队“革命造反团”成员、“石油工业部五好职工”黄成厚（新华社通讯里记叙了他被气流火浪打倒在泥沟里仍坚持爬起来忍痛打开已经烧红的水管闸门的事迹），前去同红卫兵辩论，双方发生冲突。川油筹委会以“打伤英雄黄成厚”为由，当晚组织人马将这些红卫兵赶出红村。

几天后，正式获知中央决定，原本认为自己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左派”的川油筹委会，被这意外一击打得晕头转向，迫于形势，宣告解散。一个月后，重新建立了川油工筹会。但川油司一派仍称之为“臭味会”（筹委会）。并像一个多月前筹委会“砸烂川油司”那样，开始了一系列“砸烂臭味会（筹委会）”的行动。

## ◇ 英雄集体卷入全面内战

5月29日。参加了中央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归来的彭家治，回到32111钻井队所在的川南矿区。向群众汇报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精神和五一节应邀参加天安门观礼见到毛主席等“喜讯”。川油筹委会一派的32111队“革命造反团”成员对这个已被开除了32111队籍的“反革命”竟能再次见到毛主席大为恼火，高喊着“打倒彭家治”、“彭家治是狗熊”的口号冲击会场，有人还脱光上衣露出身上“血战火海”留下的伤疤，要彭家治来比谁是真正的“英雄”。两派群众从相互谩骂发展到扭打。新华社通讯中曾记叙彭家治与胡德炳等在“血战火海”时自动形成一个战斗小组去打开五号放喷闸门的事迹，而这时他们却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

6月11日，川油司召开新生代表大会，彭家治再次被推选为负责人。在这期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派出的军管会已经进驻红村。已被舆论压力和川油司等造反派的报复性打击搞得焦头烂额的川油筹委会（工筹会），“满眶热泪迎亲人”，以为亲人解放军是来支持自己的。谁知形势已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曾经坚决执行毛泽东批示的前一个《中央军委命令》，“镇压反革命”，现在又坚决执行毛泽东批示的又一个《中央军委命令》，为前一段时间里打成的“反革命”平反。军管会按照《红十条》精神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川油司一边。当时很少有人去怀疑毛泽东那些前后矛盾、模棱两可、忽左忽右、似是而非、可作多种解释的“最高指示”和那些谁也猜不透的“伟大战略部署”会有什么问题，遇到问题只有在“走资派”或“阶级敌人”方面去找原因。在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教育中形成了特定思维方式的人们，相互间动辄就“疑人偷斧”地往“反革命”上想。群众间的对立自然是有增无减，川油筹委会与川油司的冲突日益扩大。7月1日和2日，红村连续两天发生武斗事件。

7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石油管理局军管会在红村召开大会，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坚决执行《红十条》，坚决支持川油司，并要与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大会遭到川油筹委会的冲击。其中自然有以“英雄”身份打头阵的32111队的人员。而端坐主席台上的也是同样有“英雄”身份的32111队原副队长彭家治。会后，军管会宣布查封川油筹委会的小报《红涛》，让川油司的小报《石油怒火》取而代之。在这过程中，又不断发生武斗事件。

两天后，曾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川油司川南分部举行欢呼军管会《七三公告》的游行，32111钻井队中，属于川油司一派的群众参加了游行，另一派群众则与当地相同观点的红联站一派群众组织一起公开抗议。双方发生冲突。昨日并肩战斗“血战火海”的战友如今相互谩骂，大打出手。

武斗迅速扩大，32111队的川油司一派群众因力量弱小，于次日撤离。“英雄集体”的两派群众正式分道扬镳，站到了“全面内战”的敌对营垒里。

武斗愈演愈烈，“文化革命”变成了“武化革命”。不久，在32111队所在的川南矿区一带，以泸州为中心形成了武斗热点，“红旗”与“红联站”两派群众组织展开了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并引发了全省许多群众组织支援参战的“武装支泸”行动。一时间炮火连天，工厂停产，水陆交通中断，长江、沱江上行驶着架起了机枪、大炮的装甲巡逻船……一派谴责对方是“反革命暴乱”，另一派谴责对方是“反革命围剿”，各自都打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各自都抨击对方是“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卖命”、“疯狂复辟资本主义”。各自都把在武斗中战死的人员称为“烈士”，都把同一首毛泽东诗词歌曲“我失骄杨君失柳……”当作哀乐播放，召开追悼会、控诉会……据四川省2000年在互联网上发布的省情简介中谈及文革时期的文字中称：“仅泸州武

斗期间，五十多万人口的合江县，从财政开支的武斗经费就达一百四十多万元，浪费粮食五百多吨。”可见其武斗规模之一斑。合江，正是32111钻井队所在地。

在这场可悲的“全面内战”中，32111钻井队的职工，昨日在“血战火海”中并肩战斗的战友，这些“集体的黄继光、集体的邱少云……”，变成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仇敌。他们离开了“开气找油”的生产岗位，满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的悲壮心情走上“保卫毛主席”的战场。在这场内战中，他们都以32111队名义发声明、提抗议，上成都和北京告状……

当年那篇新华社通讯中曾记叙了这样一个细节：

大火熄灭后，副队长彭家治穿过人群，走过烟雾弥漫的井场，大声喊着：“32111队的同志集合！”

然而，毛泽东点燃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却使得这个英雄钻井队的职工们再也不能像那样集合在一起了。就在全中国许多地方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打得难分难解的1967年7、8、9月，毛泽东乘坐一般群众不得接近的专列，通过听取汇报“视察”了大江南北一些地方。10月7日，中共中央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发往各地，要求“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泽东在这些“光辉指示”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对于各地的大动乱和全面内战，毛泽东见解独到地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不过，毛泽东仍然为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分裂为两大派感到困惑不解。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他同时却又以赞赏的口气谈到许多家庭的分裂：“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他分析工人分成两派的原因时说，“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

于是，按照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各地分裂的群众组织陆续开始大联合，并在联合过程中你揪我的“黑手”，我揪你的“坏人”，或者自己揪自己内部的“黑手”与“坏人”。又是新的对立，又是新的冤案……真是“走资派”的挑动和“坏人”的破坏导致了群众的分裂吗？从32111钻井队这个英雄集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并非如此。

在各地区、各单位出现的群众大分裂，自然各有其不同的特殊原因，除去“文革”中不同观点和利益的冲突外，还不乏历次政治运动积淀的历史积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恩怨，小团体小圈子利益的冲突，以及带封建色彩的宗族矛盾，邻里之间的是非口角，甚至会夹带有“清官难断”的家庭纠纷……但是，导致群众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正是那一整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所谓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被几亿人“落实在行动上”，才导致了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悲剧性分裂，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